

减税与减负

——来自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冯俊诚*

摘要 减税是助力市场主体纾困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在减税政策落实前后的策略性行为可能会弱化其经济效果。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所涉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研究发现,当税率由 33% 降至 15% 时,企业有效税率仅下降 3.33 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高、规模较大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减税,同时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政府干预和较高的法制水平均促进了减税效果的发挥。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并未发现该减税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和提升盈利能力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所得税优惠政策,有效税率,双重差分

DOI: 10.13821/j.cnki.ceq.2022.01.04

一、引言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减税成为中国政府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释放增长动能的重要举措。有效的减税方案需植根于一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税收特征事实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多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而中国税制则以流转税为主。在直接税为主体税制的情境下,降低所得税一方面直接增加居民税后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增长带来产品需求增加,刺激企业投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共同扩张拉动了社会总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以所得税为核心内容的减税方案与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相呼应。对以间接税为主体税制的中国而言,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经济效应如何,现有经济理论尚未给出明确指引。其次,虽然不断增强的征管能力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高培勇,2006;王剑锋,2008;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谢贞发,2016),但中国的税收征管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此时,忽略发展中国家在税制结构、征管水

* 冯俊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通信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361005;电话:18959211095;E-mail: fengjuncheng@xmu.edu.cn。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72021046)的资助。作者感谢吕冰洋教授以及多位匿名审稿专家的点评和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基于发达国家特征事实和历史经验的“教科书”式减税政策被认为与中国国情不相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2)。

特别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简单地降低法定税率可能会造成企业税负下降有限,减税政策失灵的局面。以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为例,一方面,在中央减税政策之前,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会迫使地方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流入。这些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实际税率。它们会削弱以降低法定税率为主要内容的减税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致使减税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在中央减税政策出台之后,严格落实该政策会大幅减少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若在制定减税政策过程中,中央政府未能及时给予地方政府额外转移支付资金来补偿其潜在税收收入的损失或者补偿资金数量较少,地方政府往往缺乏经济激励来落实减税政策。也即,减税政策实施之前业已存在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和政策落实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将严重削弱减税政策的经济效果。那么,在中国的税收实践中,上述两种作用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减税政策的效果发挥,税率下降与企业税负降低之间的数量关系如何呢?基于此,以西部大开发战略涉及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展开评估。

依据财税[2001]202号文件,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低于其他企业33%的税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行业信息,本文以属于鼓励类产业目录且在2001年之前成立的企业为回归样本,并以西部地区企业为处理组、非西部地区企业为控制组来估计税率下降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税率由33%降至15%时,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仅下降3.33个百分点。在跨国比较中,该税收政策的减税效应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该减税政策呈现出“助强不扶弱”的现象,即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高、规模较大的企业减税效应更大;此外,减税效果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干预水平低和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得到更好的发挥。

本文研究意义主要表现为:首先,利用微观企业数据,为税率与实际税负间的数量关系提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以欧美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学者们在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缺乏共识(Blanchard and Perotti, 2002; Romer and Romer, 2010; Jaimovich and Rebelo, 2017),现有实证研究中,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也远低于理论预期(Cloyne, 2013; Mertens and Ravn, 2013)。此时,明确税率和实际税负间的数量关系,既是政府制定合宜减税方案的基本前提,又是评估减税政策效果的关键参数。

其次,在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的背景下,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为中

国的减税政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现有研究如聂辉华等（2009）、申广军等（2016）、许伟和陈斌开（2016）、Zhang *et al.*（2018）和 Liu and Mao（2019）多聚焦于增值税，仅少量文献基于企业所得税视角展开分析（如李明等，2018；刘啟仁等，2019），而在减税政策的争论中，企业所得税则吸引更多的目光。对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的效果评估仍较为缺乏，本文研究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切入点，对现有文献形成重要的补充。

再次，在探究企业减税政策获得感不强成因的基础上，本文为实现实质性减税目标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实质性减税”，增强“企业获得感”¹，《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²，2019 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作为当年税务系统的重点工作任务。探究减税政策在落实中，各参与主体面临的现实约束以及行为特征是促进减税政策落地生根，消除“减税不减负”现象，达成实质性减税目标的理论前提。

最后，本文分别从企业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减税效应异质性研究，为考察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的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减税政策有效性相比，减税政策的分配效应也应引起关注。减税政策不仅要直击市场主体的痛点，更要确保政策效应的公平分配。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可能导致减税政策的经济利益在企业间的不公平分配，进而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留下隐患。减税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是否有利于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理应成为评估减税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本文余下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中国税收征管实践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基本估计结果，第五部分为减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为进一步研究，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研究假说

理论上，财税〔2001〕202 号文件中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举措会如何影响企业税负呢？首先，业已存在的区域性税收优惠会制约以税率来降低企业税负的政策空间。税收竞争被视为地区间为增长而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王小龙和方金金，2015），而税率的灵活性（郭杰和李涛，2009）、弱化税收征管（谢贞发，2016）等也成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手段。就本文研

¹ 详见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

² 详见《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zfgzbg.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

究对象而言,税收竞争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财税[2001]202号文件实施之前,迫于招商引资压力,地方政府会试图采取各种优惠举措来降低辖区企业面临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税务成本。例如1994—2002年间福建省省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就有26项58条(福建省地税年鉴编辑委员会,2004)³,这些地方性优惠政策会使得企业面临的实际税率显著低于法定税率。以1997—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为例,1998—2007年间,工业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处于11%—16%之间,该比例远低于33%的法定税率。同时,大量盈利的企业仅缴纳少量、甚至不缴企业所得税。如2007年应纳所得税税额为零的样本中,利润大于100万的工业企业占比高达34.89%。换言之,税收竞争使得企业享受地方政府给予优惠税收政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挤占了未来中央政府减税政策的政策空间,削弱了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财税[2001]202号文件出台后,对于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虽然法定税率由33%将至15%,但由于它们已经享受多项地方性优惠政策,其实际税率的降幅会远低于18个百分点。

其次,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可能会为减税政策的落实增添诸多障碍。以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为例,西部地区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大于零的企业有16608家,其中,符合财税[2001]202号文件政策优惠的企业高达10085家。若严格执行该减税政策,这意味着高达60.72%的应纳税额为正的企业将适用15%的低税率。在缺乏资金补偿的情况下,该项优惠政策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大量减少。可预见的财政困境将会迫使地方政府在减税政策的落实上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来缓解减税政策引致的财政压力,诸如通过消极宣传、模糊化实施细则等方式来阻碍政策落实(李文涛和李润明,2015;董光晖,2018)。此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伴随财税[2001]202号文件的落实,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程度势必加剧。此时,地方政府极有可能通过强化税收征管将因中央减税政策“流失”的税收补征回来(Chen,2017),而税收征管的加强将部分抵消减税政策的减税效应。此时,不论地方政府是采取消极执行减税政策,还是强化税收征管均会阻碍减税政策效果的发挥。

综上所述,当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3%降低至15%时,有两大因素严重影响企业税负的下降幅度。一是在减税政策实施之前,企业业已享受的、由地方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二是为了应对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

³ 现实中,此类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一般难以公开、准确获取,但从零星的新闻报道中仍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如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公众号(山东高法)2020年11月12日的报道,“地方招商优惠政策不兑现,被判返还1116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AxMjk5Ng==&.mid=2652116402&.idx=1&.sn=81446f9ff98d0860df610f77439934d5&.chksm=8bf29999bc85108f407982b5d897c4ab341d36a94e27a74e59bb1562c73ba31bb01b84616388#rd,访问时间:2021年7月1日。

在落实减税政策中的策略性行为。现实中，上述两种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减税效应的发挥，税率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数量关系到底如何，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理论假说：

研究假说 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带来的税率大幅下降会降低企业税负负担，但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前后的策略性行为会降低政策的减税效果。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以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来衡量企业税负程度，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来估计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在减税政策颁布时，业已存在且符合条件的企业是优惠政策的直接受惠者。依据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的具体内容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行业信息，本文以属于鼓励类产业目录且在 2001 年之前成立的企业为回归样本，并将西部地区企业作为处理组、非西部地区企业视为控制组来估计税率与有效税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TAX_{ijct} = \alpha_1 West_c \times yr2001_t + Z\lambda + \delta_t + \eta_c + \mu_j + \theta_{cj} + \pi_{jt} + \varepsilon_{ict}, \quad (1)$$

其中， $ETAX_{ijct}$ 表示城市 c 行业 j 企业 i 在 t 年的有效税率（应纳所得税税额/企业利润）。 $West$ 为企业所在地是否为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当且仅当企业所在地为西部时，取值为 1，其他为 0； $yr2001$ 为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年份的虚拟变量，在 2001 年及之后，取值为 1，其他为 0。 α_1 是核心参数，它度量了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实施对企业有效税率的政策效应大小。

Z 为一系列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 δ_t 、 η_c 、 μ_j 分别为年份、城市和行业的固定效应以便控制时间、地区和行业等特定因素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同时，本文在计量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 \times 行业 (θ_{cj}) 和行业 \times 年份 (π_{jt}) 固定效应，以此来消除城市 \times 行业税收征管力度差异以及行业经济波动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仅保留 2001 年之前成立且符合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中鼓励类行业的企业样本。依照《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2000 年修订）》，本文采用 2 位行业代码来识别该行业是否属于鼓励类行业。在获取全部鼓励类企业数据后，本文遵照如下规则剔除相应的观测值：（1）同一年份，法人代表非唯一；（2）员

工人数小于8人,总产值低于100万元;(3)固定资产净值、实收资本、负债率等变量为负;(4)成立年份早于1949年;(5)关键变量缺失(如企业利润、应纳税所得税税额等);(6)东北三省企业⁴。最终,获得1998—2007年间10 097家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西部地区企业1 678家,非西部地区企业8 419家。遵循文献通常做法,当企业有效税率为正时,保留数值,当企业有效税率为负时,赋值为0。考虑到变量奇异值对回归分析的影响,本文利用Stata软件中winsor命令对最大和最小2.5%的样本进行缩尾处理。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数值统计特征。

表1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TAX</i>	应纳税额/企业利润(%)	100 970	15.464	16.361	0	57.483
<i>West</i>	是否为西部地区企业	100 970	0.166	0.372	0	1
<i>Loss</i>	当年利润是否为负	100 970	0.098	0.298	0	1
<i>Central</i>	隶属关系是否为中央或省级	100 970	0.126	0.332	0	1
<i>Profit</i>	销售利润/销售额(%)	100 970	12.964	11.391	-4.804	43.971
<i>SOE</i>	是否为国有控股	100 970	0.253	0.435	0	1
<i>FOR</i>	是否为外资控股	100 970	0.230	0.421	0	1
<i>Age</i>	企业年龄(取自然对数)	100 970	2.757	0.738	0	4.060
<i>Emp</i>	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100 970	5.499	1.201	2.079	11.576
<i>Debt</i>	负债/总资产(%)	100 970	57.724	24.184	8.980	108.123
<i>Asset</i>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100 970	10.852	1.535	5.030	18.586
<i>Prod</i>	总产值/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100 970	5.275	1.140	0.584	13.699

表2中,2001年之前,西部地区企业平均有效税率约为15.63%,较非西部企业高约0.81个百分点;2001年后,西部地区企业平均有效税率降至13.32%,而非西部地区企业平均有效税率则上升至16.15%。在2001年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有效税率的差额减少了3.64个百分点。图1展示的结果更为直观,在财税[2001]202号文件实施之前,西部地区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略高于非西部地区企业,但2001年之后,西部地区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不断下降,逐渐低于非西部地区企业,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持续扩大。

⁴ 考虑到2003年实施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在基础回归中本文剔除了东北三省的企业样本。此外,包含东北三省企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与文中回归结果相一致,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 2 西部和非西部企业平均有效税率比较

	西部企业	非西部企业	组间差异	DID
1998—2000 年	15.628 (17.328)	14.815 (16.417)	0.812*** (0.256)	
2001—2007 年	13.325 (15.947)	16.154 (16.287)	-2.829*** (0.164)	-3.641*** (0.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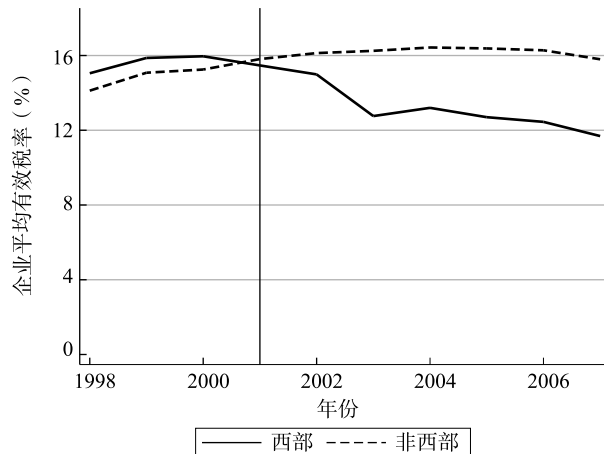


图 1 1998—2007 年间西部和非西部地区企业平均有效税率变化趋势

四、税率降低的减税效应

(一) 基本实证结果

表 3 展示了基本的估计结果。第 (1) 列中, 2001 年后, 西部地区企业有效税率下降了 3.67 个百分点, 与表 2 中的统计结果较为接近。加入行业×年份和城市×行业固定效应后, 政策效应大小约为 3.33%。这意味着所得税税率由 33% 降为 15% 时, 企业有效税率仅下降 3.33 个百分点。回归样本中 2001 年西部地区企业平均利润约为 361.06 万元, 因此, 企业平均税负减少约 12.02 万元, 整体减税规模约为 2.02 亿元。回归样本中 2001 年西部地区企业平均应纳税额为 74.87 万, 当税率由 33% 降至 15% 时, 应纳税额减少 16.05%, 此时, 税率-应税所得弹性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ETI) 约为 0.71。已有研究结果中, 英国、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ETI 分别为 0.13 (Deverux *et al.*, 2014)、0.2 (Gruber and Rauh, 2007) 和 0.59 (Basri *et al.*, 2019)。⁵ 根据上述 ETI 数值测算, 当税率由 33% 降至 15% 时, 英国和美国企

⁵ Saez *et al.* (2012) 认为, 税基较窄、扣除项目多以及逃避税机会均会导致 ETI 的数值较大。

业的减税规模将是本文估计结果的3倍左右,印度尼西亚企业的减税规模也比本文估计结果高出40%。这表明,在跨国的比较中,财税[2001]202号文件的减税效应处于较低的水平。

表3 基本回归:西部大开发与有效税率

	(1)	(2)	(3)	(4)
$West \times Yr2001$	-3.662*** (0.310)	-3.324*** (0.314)	-3.669*** (0.313)	-3.328*** (0.310)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城市×行业			是	是
观测值	100 970	100 970	100 970	100 970
R^2	0.171	0.173	0.248	0.251

注: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如何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并将估计出的经济效应归因于特定政策,一直是政策评估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具体政策实施细节,本文采用间接方法来逐一排除这些潜在的政策影响,具体方式如下:

第一,2001年之前发生、作用于西部地区的其他经济政策。如果有潜在的、与西部大开发相关的经济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税负产生影响,那么,该政策效果将会在2000年(甚至更早)发挥作用。基于此,在表4的第(1)列和第(2)列中,本文采用构造虚假政策的方法,即分别构建1999年和2000年两个虚拟变量($Yr1999$ 和 $Yr2000$)以及它们与变量 $West$ 的交互项,并将回归样本时间限制在1998—2001年的方式来进行检验。估计结果中,交互项 $West \times Yr1999$ 和 $West \times Yr2000$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而 $West \times Yr2001$ 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这表明表3的估计结果并不是因为2001年之前发生类似的政策导致的。此外,图2中基于1997—2007年企业样本的平行趋势检验也从侧面排除了2001年之前发生类似政策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

表4 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1)	(2)	(3)	(4)	(5)
$West \times Yr2001$	-1.125*** (0.422)	-1.102** (0.429)	0.068 (0.066)	-2.244 (1.987)	-3.375*** (0.316)
$West \times Yr1999$	0.013 (0.386)				

(续表)

	(1)	(2)	(3)	(4)	(5)
<i>West</i> × <i>Yr</i> 2000		0.082			
		(0.365)			
<i>Nearby</i> × <i>Yr</i> 2001					-0.396
					(0.431)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0 388	40 388	100 970	1 280	100 970
R^2	0.314	0.314	0.379	0.385	0.251

注：表中第(3)列被解释变量为增值税有效税率，第(4)列仅包含外资控股企业样本。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 × 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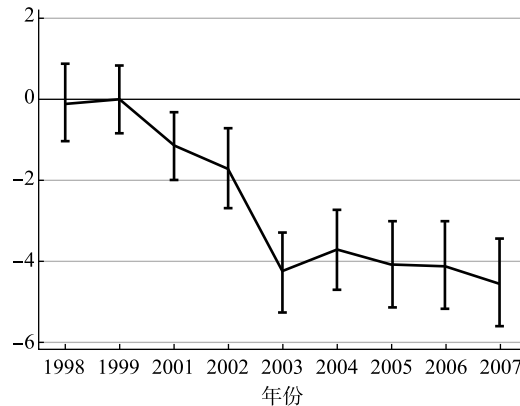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曲线为年份与 *West* 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以 2000 年为基准），竖线表征估计系数 95% 的置信区间。

第二，2001 年发生、作用于西部地区的其他经济政策。那么，是否存在与该政策同时发生且作用于企业税负的其他政策呢？首先，本文核心政策为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仅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并未涉及增值税。其他潜在、未被观测到的经济政策会影响企业经营行为，进而导致所得税税负下降，这些政策同时也可能会导致企业增值税税负变化。此时，可以用企业增值税税负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构建安慰剂检验。其次，在 2008 年新企业所得税实施之前，多数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 15% 或者接近 15%，因此，也可使用外资企业样本来构建安慰剂检验。表 4 第 (3) 列和第 (4) 列分别展示了以

增值税税负作为被解释变量和以外资控股企业为回归样本的估计结果。其中, $West \times Yr2001$ 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异于零,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排除 2001 年发生、同时作用于西部地区的其他经济政策的存在。

第三, 2001 年发生、不限于西部地区的经济政策。由于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仅适用于西部地区, 那么, 本文可选择与西部地区地理相邻的中部地区企业来构建安慰剂检验。具体地, 当企业位于中部省份, 且临近西部省份的地级市时, 虚拟变量 $Nearby$ 取值为 1, 其他为 0。在第 (5) 列回归中, $Nearby \times Yr2001$ 的系数为负,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 减税效应仅发生在西部地区的企业中, 地理位置靠近西部的中部企业并未发现有效税率在 2001 年之后有下降的经验证据。上述的相关检验也许并未能排除所有潜在的其他政策影响, 但它们能够较为充分地表明, 表 3 中交互项 $West \times Yr200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确实是由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中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引起的。

(二) 稳健性分析

1. 控制组和处理组的选取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来估计政策效应时, 合理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尤为重要。考虑到西部和非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为了克服企业选址决策所引致的样本自选择问题, 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稳健性检验: 第一, 利用企业地理信息来缩小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差异, 将回归样本中企业地址限定在中部和西部分界处的地级市, 即以西部地区且该地级市在分界处的企业为处理组, 以中部地区且该地级市在分界处的企业为控制组。第二, 在使用双重差分进行估计之前,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回归样本进行筛选, 挑选出在控制变量上更为相似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表 5 中第 (1) 列展示了采用相邻地级市回归样本的估计结果, 第 (2) 列和第 (3) 列分别是采用最邻近匹配进行“1 对 1”和“1 对 2”配对后的样本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交互项 $West \times Yr2001$ 的系数均与表 3 中的结果极为接近。

表 5 控制组和处理组的选取

	相邻城市	1—1 匹配	1—2 匹配
	(1)	(2)	(3)
$West \times Yr2001$	-2.260*** (0.657)	-3.253*** (0.415)	-3.151*** (0.363)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续表)

	相邻城市	1—1 匹配	1—2 匹配
	(1)	(2)	(3)
城市×行业	是	是	是
观测值	7 170	22 420	32 370
R ²	0.347	0.333	0.311

注：表中第(1)列为中西部分界线上相邻城市的企业样本，第(2)列和第(3)列为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之后的匹配样本。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2. 亏损企业

企业发生亏损对所得税有效税率的影响表现为：一是若企业当期应纳税额为负，实际缴纳税额和有效税率均为零；二是税法允许亏损弥补，这将会降低企业未来年份的有效税率。实证中，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企业亏损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首先，在表6第(1)列的回归中加入企业在上一年度利润是否为负的虚拟变量($Loss_{t-1}$)。其次，考虑到在创业早期，资本支出较多和销售活动开展较为困难，企业更容易发生亏损。在第(2)列的回归分析中剔除成立时间在1995年及之后的企业样本。最后，在第(3)列回归估计中仅保留1998—2007年内且利润始终为正的企业样本。表6前三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的亏损行为虽会影响减税政策的效应大小，但这一影响并未改变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此外，考虑到样本数据中有效税率为零的样本较多，在第(4)列和第(5)列中，本文以企业当年应纳税额是否大于零和当年应纳税额是否大于10万元作为被解释变量。 $West \times Yr2001$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财税[2001]202号文件中的优惠政策不仅降低了西部地区企业的有效税率，也降低了西部地区企业缴纳所得税的概率。

表 6 亏损企业处理

	(1)	(2)	(3)	(4)	(5)
$West \times Yr2001$	-3.290*** (0.358)	-3.154*** (0.325)	-5.334*** (0.515)	-0.027*** (0.009)	-0.021*** (0.008)
$Loss_{t-1}$	-10.096*** (0.172)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1)	(2)	(3)	(4)	(5)
观测值	90 873	82 510	20 640	100 970	100 970
R^2	0.290	0.256	0.347	0.276	0.327

注：表中第(2)列剔除成立时间在1995年及之后的企业样本，第(3)列仅包含利润始终为正的企业样本，第(4)列和第(5)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当年应纳税额是否大于零和是否大于10万元。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五、减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上文实证分析表明，降低税率确实使得企业有效税率下降。此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税负降低的情况下，什么类型的企业从中获益更大呢？

(一) 减税效应异质性分析：企业层面

在企业层面，本文分别从所有制性质、行政级别、技术水平和企业规模等角度展开异质性分析。

首先，较之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享受更多的优惠（吴文锋等，2009）和更低的税负（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那么，在适用税收优惠时，国有企业是否比私营企业减税更多呢？表7第(1)列，采用国企控股变量 SOE 与 $West \times Yr2001$ 交互项的方式来捕捉减税效应在所有制类型上的异质性。从 $West \times Yr2001 \times SO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减税幅度更大。

其次，在税法执行难以做到有法必行、执法必严的情况下，企业的政治级别或许能在税收征管中为企业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本文以隶属关系作为企业政治级别的度量变量，并以是否隶属中央或者省政府构建虚拟变量 $Central$ 来估计企业政治地位对减税效应的影响。第(2)列的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企业，隶属关系为中央或省政府的企业有效税率下降更多。

表 7 企业层面减税效应的异质性

	(1)	(2)	(3)	(4)	(5)	(6)
$West \times Yr2001$	-2.744***	-2.975***	-3.125***	-2.955***	-3.026***	-2.913***
	(0.366)	(0.337)	(0.322)	(0.334)	(0.322)	(0.337)
$West \times Yr2001 \times SOE$	-1.421***					
	(0.442)					

(续表)

	(1)	(2)	(3)	(4)	(5)	(6)
<i>West</i> × <i>Yr</i> 2001 × <i>Central</i>		-1.602*** (0.439)				
<i>West</i> × <i>Yr</i> 2001 × <i>Sale</i>			-0.875** (0.356)			
<i>West</i> × <i>Yr</i> 2001 × <i>Emp</i>				-1.220*** (0.339)		
<i>West</i> × <i>Yr</i> 2001 × <i>Value</i>					-1.280*** (0.336)	
<i>West</i> × <i>Yr</i> 2001 × <i>Asset</i>						-1.456*** (0.341)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0 970	100 970	100 970	100 970	100 970	100 970
R^2	0.251	0.251	0.251	0.251	0.251	0.251

注：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 × 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本文分别从企业销售额、人员数、工业产值和总资产等角度分析企业规模对减税效应的影响。理论上，企业规模可能的作用机制有：第一，在税收征管中，企业规模越大，各项应纳税款也越多，企业越有可能被认定为重点税源企业，税务部门对其税收征管倾向于更加严格。严格的税收征管导致规模较大的企业税收遵从较高，当优惠政策出台时，它们反而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第二，在经济绩效考核下，企业规模越大，地方政府越重视，会给予更多的政策照顾。此时，税收优惠政策在大企业身上能够得到更好的执行和落实。第三，避税方案具有规模效应，规模较大企业更可能采用税收筹划来减低税负。与此同时，避税方案的产生和执行均对企业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通常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为其雇员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和晋升空间，进而招募到高素质的财会人员。前两种情况下，企业规模与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正相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优惠政策反应较为不敏感。在表 7 后四列的估计中，不论是以销售规模 (*Sale*)、人员数 (*Emp*)、工业产值 (*Value*)，还是总资产规模 (*Asset*) 处于前 25% 分位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企业规模与 *West* × *Yr*2001 的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总是显著为负,也即企业规模越大,减税效应越强,这表明前两种作用机制在现实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 减税效应异质性分析:地区层面

地区宏观因素也是影响税收征管的重要因素,本节分别从地区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对减税效应的展开异质性分析。

首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税基越大,这从两个方面对税收征管产生影响: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能较为容易地为地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在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并不高,企业所得税征管是否有效、严不严格并不影响地区宏观大局。二是税基越大,表明当地税源充裕、税收收入高,地方政府更能承担得起“放水养鱼”所带来的当期财政收入损失。综上,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越是缺乏动机通过加强企业所得税征管来筹集财政资金,反而可能“有意地”弱化所得税征管来培育当地企业,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能。在表 8 第 (1) 列中,本文以地级市人均 GDP 是否处于前 25% 分位构建虚拟变量 GDP 。其中, GD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West \times Yr2001 \times GDP$ 的估计系数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并不显著。这表明,地区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平均有效税率越低,但并未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减税效应异质性的经验证据。

其次,地区财力丰裕程度对税收征管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充裕的财政资金意味着税务部门的经费充足,为税务部门开展征管活动提供了财力上的保障。足额的人员配备和充裕的办公经费无疑会增进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这将提升本辖区的企业有效税率。另一方面,在完成额定的税收征收目标后,税务部门对余下的税收征收可能缺乏动力。相对绩效考核容易造成税收征收任务逐年加重,形成“鞭打快牛”现象,即今年税收多征意味着明年需要征收更多的税收才能完成新的目标任务。因此,在税源充裕的地区,税务部门在完成本年度征收计划后,往往对超额的应收税款缺乏积极性,这会降低辖区企业的税收负担。本文以地级市人均财政支出排名是否处于前 25% 分位表征地区财力丰裕程度 (Exp)。在第 (2) 列估计结果中, $West \times Yr2001 \times Exp$ 和 Exp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并未发现地区的财力充裕程度对企业有效税率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考虑到财力来源的不同,本文进一步分析财政自主度 (Fis) 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从第 (3) 列的估计结果看,财政自主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有效税率越低,但税收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在财政自主度较高的地区(前 25% 分位)和其他地区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最后,经济制度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经济制度的优劣势必影响市场经济中政府与企业关系,进而对税收征管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樊纲等

(2011) 编制的市场化指数, 本文从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法制水平三个角度探讨经济制度对减税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 按照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法制水平三个指标优劣程度从好到差排序, 取前 25% 分位的数值作为分界线, 构建高市场化程度 (*Mkt*)、少政府干预程度 (*Gov*) 和高法制水平 (*Law*) 三个虚拟变量, 再将其与 *West* × *Yr2001* 做交互项进行估计 (第 (4) — (6) 列)。估计结果表明, 在控制其他因素后,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和法制水平较高的地区, 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表 8 地区层面减税效应的异质性

	(1)	(2)	(3)	(4)	(5)	(6)
<i>West</i> × <i>Yr2001</i>	-2.631*** (0.411)	-2.718*** (0.427)	-2.831*** (0.396)	-2.547*** (0.414)	-2.358*** (0.407)	-2.609*** (0.391)
<i>West</i> × <i>Yr2001</i> × <i>GDP</i>	-0.755 (0.574)					
<i>GDP</i>	-0.683** (0.267)					
<i>West</i> × <i>Yr2001</i> × <i>Exp</i>		-0.315 (0.591)				
<i>Exp</i>		0.269 (0.266)				
<i>West</i> × <i>Yr2001</i> × <i>Fis</i>			0.939 (0.752)			
<i>Fis</i>			-1.329*** (0.405)			
<i>West</i> × <i>Yr2001</i> × <i>Mkt</i>				-1.022** (0.513)		
<i>Mkt</i>				0.086 (0.244)		
<i>West</i> × <i>Yr2001</i> × <i>Gov</i>					-1.294*** (0.452)	
<i>Gov</i>					0.116 (0.235)	
<i>West</i> × <i>Yr2001</i> × <i>Law</i>						-1.209** (0.541)

(续表)

	(1)	(2)	(3)	(4)	(5)	(6)
<i>Law</i>						-0.017 (0.237)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4 980	84 980	84 980	84 980	84 980	84 980
R^2	0.242	0.242	0.242	0.242	0.242	0.242

注：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六、进一步研究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仅是减税政策的初始目标，激发市场活力、刺激地区经济发展才是减税政策的最终目的。本部分将围绕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对企业发展展开进一步分析。首先，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如何刺激企业增加投资是宏观政策关注的焦点，而现有文献也就减税政策是否促进企业投资展开广泛讨论（如许伟和陈斌开，2016；申广军等，2016；Liu and Mao, 2019；刘啟仁等，2019）。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分别以投资对数值（许伟和陈斌开，2016；刘啟仁等，2019）和投资增长率（申广军等，2016；Liu and Mao, 2019）来度量企业投资行为。表 9 中不论采用何种指标来度量企业投资，抑或选用 1998—2007 年、1998—2003 年或 1 对 1 匹配样本，*West* × *Yr*2001 的估计系数始终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异于零。这意味着本文并未发现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促进西部地区企业增加投资的经验证据。

表 9 减税政策与企业投资

	1998—2007 年		1998—2003 年		1—1 匹配	
	对数值	增长率	对数值	增长率	对数值	增长率
	(1)	(2)	(3)	(4)	(5)	(6)
<i>West</i> × <i>Yr</i> 2001	0.021 (0.017)	-0.534 (1.298)	0.028* (0.017)	1.086 (1.440)	0.012 (0.022)	1.549 (1.863)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1998—2007 年		1998—2003 年		1—1 匹配	
	对数值	增长率	对数值	增长率	对数值	增长率
	(1)	(2)	(3)	(4)	(5)	(6)
观测值	100 970	90 711	60 582	50 353	22 420	20 139
R ²	0.828	0.048	0.816	0.066	0.842	0.081

注：表中回归估计均包含所有制类型、年龄、负债率、资产规模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税务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理应有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但企业所得税较为特殊，它是对企业所得税进行课税，从理论上讲，所得税减税政策仅对所得为正的企业产生影响，该优惠政策影响企业税后收益的大小，并不能改变企业的盈利状态。在现实的公共讨论中，减税政策往往被宣传成拯救企业的灵丹妙药，是决定企业“起死回生”的关键因素。那么，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呢？特别地，它是否有助于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呢？

以销售利润率 (*Profit*) 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表 10 中对前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在表 10 前三列中，不论是采用何种回归样本均未发现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出台后企业销售利润率增加的经验证据，这意味着所得税减税政策未能显著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进一步考察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对亏损企业的影响，在表 10 的后四列中仅包含 2000 年总利润为负的企业样本。在第 (4) 列和第 (6) 列中 $West \times Yr200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即便对于会计利润为负的企业，财税 [2001] 202 号文件的出台仍降低了其有效税率，但与表 3 中的估计结果相比，税收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有所下降。在以销售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West \times Yr2001$ 的估计系数始终不显著，这意味着所得税减税政策未能有效帮助亏损企业“扭亏为盈”。整体而言，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企业发展是“锦上添花”，难以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

表 10 减税政策与企业盈利

	全部企业			亏损企业			
	1998—2007 年	1998—2003 年	1—1 匹配	1998—2007 年		1998—2003 年	
	<i>Profit</i>	<i>Profit</i>	<i>Profit</i>	<i>ETAX</i>	<i>Profit</i>	<i>ETAX</i>	<i>Profit</i>
	(1)	(2)	(3)	(4)	(5)	(6)	(7)
$West \times Yr2001$	0.137 (0.176)	-0.078 (0.185)	0.460* (0.248)	-2.388*** (0.749)	-0.002 (0.682)	-1.838** (0.814)	0.392 (0.709)
城市、行业和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全部企业			亏损企业			
	1998—2007 年	1998—2003 年	1—1 匹配	1998—2007 年		1998—2003 年	
	<i>Profit</i>	<i>Profit</i>	<i>Profit</i>	<i>ETAX</i>	<i>Profit</i>	<i>ETAX</i>	<i>Profit</i>
	(1)	(2)	(3)	(4)	(5)	(6)	(7)
城市×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0 970	60 582	22 420	5 090	5 090	3 054	3 054
R^2	0.403	0.447	0.501	0.413	0.442	0.453	0.422

注：表中第(1)—(3)列包含全部企业的回归样本，第(4)—(6)列仅包含2000年总利润为负的企业样本。第(1)—(3)列、第(5)列和第(7)列回归估计均包含所有制类型、年龄、负债率、资产规模等控制变量。第(4)列和第(6)列回归估计均包含当年是否亏损、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销售利润率、年龄、员工人数、负债率、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年份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七、结 论

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税[2001]202号文件)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该税收优惠的减税效应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当税率由33%降至15%时,企业有效税率仅下降3.33个百分点。业已存在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中的策略性行为制约了减税政策效果的发挥,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较多掣肘。这一方面表明,注重基层政府的激励结构是影响减税政策落地生根,实施实质性减税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税收政策宏观调控能力高度依赖于规范、高效、公正的税收征管体系,逐步清理和规范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对发挥减税政策的经济效果至为重要。本文研究还发现,财税[2001]202号文件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未起到“扶弱”的效果,反而呈现出“扶强”的特征。这不但有违税收公平,更重要的是侵蚀了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造成经济效率损失。未来减税政策设计时应关注减税利益的分配,要确保减税政策对构建公正、有序竞争的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伴随近年来税收征管体制建设和完善,尤其是金税工程以及征管机构改革等诸多举措,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和规范程度远高于本文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因此,本文研究结论不宜简单地生搬硬套,将之直接应用于理解和诠释当下的减税降费政策,而应将其视作历史长河之中的减税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知识和经验。同时,本文研究对象为2001年之前成立的企业,考察的是财税[2001]202号文件对现存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并未涉及该优惠政策对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即本文仅关注该优惠政策在集约边缘的政策效果,其在广延边缘的政策效果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Basri, M. C., M. Felix, R. Hanna, and B. A. Olken, "Tax Administration vs. Tax Rates: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Taxation in Indonesia", 2019, NBER Working Papers 26150.
- [2] Blanchard, O., and R. Perotti,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4), 1329-1368.
- [3]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 《税务研究》, 2002 年第 8 期, 第 18—24 页。
- [4] Chen, X. G., "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47, 62-76.
- [5] Cloyne, J., "Discretionary Tax Changes and the Macroeconomy: New Narrative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4), 1507-1528.
- [6] Devereux, M. P., L. Liu, and S. Loretz, "The Elasticity of Corporate Taxable Income: New Evidence from UK Tax Record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4, 6 (2), 19-53.
- [7] 董光晖,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研究——基于四川国税的视角", 《税收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第 1—6 页。
- [8]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 [9] 福建省地税年鉴编辑委员会, 《福建地税年鉴》。福州: 福州市印刷纸品厂, 2004 年。
- [10] 高培勇, "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 《经济研究》, 2006 年第 12 期, 第 13—23 页。
- [11] Gruber, J., and J. Rauh, "How Elastic Is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Base?", In: Auerbach, A. J., J. R. Hines, and J. Slemrod (eds.), *Taxing Corporate Income in the 21st Centur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0-163.
- [12] 郭杰、李涛, "中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2009 年第 11 期, 第 54—64 页。
- [13] Jaimovich, N., and S. Rebelo, "Nonlinear Effects of Taxation o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 (1), 265-291.
- [14] 李明、李德刚、冯强, "中国减税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试验’", 《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7 期, 第 121—135 页。
- [15] 李文涛、李润明, "对广西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思考", 《经济研究参考》, 2015 年第 5 期, 第 75—77 页。
- [16] 刘慧龙、吴联生, "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4 期, 第 42—52 页。
- [17] 刘启仁、赵灿、黄建忠, "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 《管理世界》, 2019 年第 1 期, 第 85—103 页。
- [18] Liu, Y. Z., and J. Mao, "How Do Tax Incentives Affec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9, 11 (3), 261-291.
- [19] 吕冰洋、郭庆旺,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 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2 期, 第 76—90 页。
- [20] Mertens, K., and M. O. Ravn, "The Dynamic Effects of Personal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4), 1212-1247.

- [21] 聂辉华、方明月、李涛,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 《管理世界》, 2009 年第 5 期, 第 17—24 页。
- [22] Romer, C. D., and D. H. Romer,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ax Changes: Estimates Based on a New Measure of Fiscal Sho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3), 763-801.
- [23] Saez, E., J. Slemrod, and S. H. Giertz, “The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with Respect to Marginal Tax Rate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50 (1), 3-50.
- [24] 申广军、陈斌开、杨汝岱,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 ——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2016 年第 11 期, 第 74—86 页。
- [25] 王剑锋, “中央集权型税收高增长路径: 理论与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08 年第 7 期, 第 45—52 页。
- [26] 王小龙、方金金,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基层政府税收竞争”, 《经济研究》, 2015 年第 11 期, 第 79—93 页。
- [27]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 《管理世界》, 2009 年第 3 期, 第 134—142 页。
- [28] 谢贞发, “中国式分税制的税收增长之谜”,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年第 5 期, 第 92—108 页。
- [29] 许伟、陈斌开, “税收激励和企业投资——基于 2004—2009 年增值税转型的自然实验”, 《管理世界》, 2016 年第 5 期, 第 9—17 页。
- [30] Zhang, L., Y. Y. Chen, and Z. Y. He,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ax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8, 25 (4), 913-945.

Tax Rate and Tax Burden —Evidence from Preferential Policy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JUNCHENG FENG*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Employing a preferential policy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for western China in 2001, we examine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rate and firms’ effective tax rate. We find that as the tax rate falls from 33% to 15%, on average, firms’ effective tax rate decreases 3.33 percentage points. Firms with more political resources such as SOE, high political level and larger size, get more benefits from this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Firms located in provinc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fewer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a larger extent of rule by law, enjoy more tax burden reductions. Meanwhile, we do not find significant evidence that this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would increase a firm’s investment or profit.

Keywords preferential policy, effective tax rat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JEL Classification H25, O23, R58

* Corresponding Author: Juncheng Feng, Department of Public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Tel: 86-18959211095; E-mail: fengjuncheng@xmu.edu.cn.